

发出自己民族的独特声音

——云南特有七个人口较少民族作家文学扫描

云南特有7个人口较少民族,是指人口在10万以下的普米族、基诺族、德昂族、布朗族、阿昌族、怒族、独龙族7个民族。他们因为历史、文化的不同,形成了各自鲜明的民族特色,他们的作家文学从无到有,健康成长,目前各个民族都已经成长起自己的第一代作家,创作了本民族第一代书面文学,在中华文学之页上写下了属于自己的一笔。从这些民族作家文学的发展过程,也可以感受到党的民族政策对人口较少民族的特殊关爱。

客观地说,这些民族的作家文学在发展上也体现出某种不平衡性,有的民族已经形成自己的作家群体,取得了丰富的文学成果,有的民族则刚刚培养出第一代作家。但无论如何,他们都在努力用文字发出一个民族的声音,加入到中华文学的大合唱中。

普米族作家群：

普米族自称“培米”,意为白人,1960年统一定名为普米族。据2000年云南省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普米族有32923人。新时期以来,一个只有3万多人人口的民族,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一批优秀的作家,以小说、诗歌、散文等方式创作了很多有影响的作品,并在全国多次获奖,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时代的奇迹。

1981年“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评选时,普米族书面文学的开启者何顺明的诗歌《啊,泸沽湖》荣获创作奖。扬格·萨甲博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创作小说,在《民族文学》《边疆文学》发表作品多篇,出版有中篇小说集《野人泪》,目前他也是普米族第一位尝试长篇小说创作的人。生活在怒江的尹善龙多年来在散文创作方面收获颇丰,著有小说集《多情的独龙河》、散文集《高黎贡山的脚印》《滇西有座雪邦山》等。他的创作并不局限于普米族,对怒江境内其他民族的生活也有表现。

作为一个有着悠久民间文化传统、与大自然有着密切关系的民族,普米族作家们似乎更擅长用诗和散文的方式来表达对世界的审美。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出版多部诗歌集、散文集。比如殷海海的诗集《火塘的歌》、散文集《遥远的山村》,鲁若迪基的诗集《我属于原始的苍茫》《没有比眼泪更干净的水》,曹翔的诗集《家乡的泸沽湖》和建全主要从事散文创作,出版了《神秘的女儿国——泸沽湖览胜》,和平的诗曾在省里几次获奖。

在全国举行的9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中,普米族作家至今已经7次获奖。

阿昌族作家群：

阿昌族是云南的独有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陇川、梁河、潞西及保山地区的龙陵等县,据2000年云南省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阿昌族有33519人。

阿昌族也有着丰富的民间文学传统,但书面文学创作则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1985年,阿昌族作者孙宇飞以其诗歌《我的筒裙花哟》荣获“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一等奖,为当代阿昌族作家文学吹响了号角。罗汉、曹明强、曹先强等人相继步入文坛。

军旅作家罗汉在阿昌族文学史上占有几个“第一”:第一个阿昌族中国作协会员,第一个创作长篇小说的阿昌族作家,作品两次荣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多年来他先后创作出版长篇小说《紫雾》《花事》,中篇小说集《阿昌女人》《红泪》,报告文学集《1992中国滇南大行动》等作品。

还有很多正在崛起的阿昌族作者:孙宇飞、赵家福、杨叶生、曹明垒、原牧、孙家文、赵安然、赵东

和、杨叶茂、们发延、赵家斌……

德昂族作家：

德昂族原名“崩龙族”。1985年9月17日经国务院批准正式改名为德昂族。“德昂”,意思是“石岩”。虽然人口只有一万多人,但却是一个像石岩一样坚强的民族,曾经创造了丰富的民间文学。和很多民族一样,德昂族的书面文学也是起步于80年代,1985年、1990年,杨志德曾以他的散文《醉人的歌》和短诗《小溪》分别荣获第二、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新时期有关部门还曾经出版过《崩龙族(德昂族)文学作品选》等,为培养第一代德昂族作家做了很多工作。

2007年,德昂族女诗人艾傈木诺诗集《以我命名》的出版,为当代德昂族文学掀起一个新高潮,结束了这个民族没有个人文学专集的历史,并成为德昂族第一个中国作协会员。目前她又完成长篇文化散文《水鼓传音》,对德昂族古老的历史文化进行探访、追溯。

基诺族作家：

基诺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有25000多人。1979年6月经确认后,成为中国的第56个民族,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第56个兄弟。

基诺族书面文学至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出现。1988年,陶润珍发表诗歌《小鸟飞走的时候》,1990年发表散文诗《我只是一个版纳姑娘》,抒发了一个版纳姑娘细腻的情思。另一位基诺族作者白忠明发表散文《今日基诺山》《泉水悠悠绕山寨》《祖祖辈辈“吃山”,今朝吃法不同》等作品,把丰富多彩的基诺文化介绍给了读者。

出生于景洪基诺族民族乡洛科新寨村的基诺族作家张志华(洛克曼沙卡),1996年开始文学创作,2008年加入中国作协,是基诺族第一个中国作协会员。张志华主要从事诗歌创作,2006年以来,他开始创作以基诺族生活为背景的中篇小说,还计划写作一部长篇小说《在爱与恨的路上》,这有可能是基诺族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

布朗族作家：

布朗族是在云南这块土地上世代生息的古老民族之一,目前人口已接近20万。

1952年生于勐海县布朗山乡老曼峨寨的岩香兰,1974年开始在报刊上发表诗歌、散文作品,为当代布朗族作家文学拉开了序幕。他的散文《土壤和花朵》《别致的婚礼》《养蜂老人》,体现出浓郁的生活气息。他还创作了布朗族文学史上第一篇小说《南州赶街》,表现了传统心理与现代意识的无声碰撞。岩香兰的散文《土壤和花朵》于1981年荣获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

另一位布朗族作家俸春华(笔名山仔)创作的小说《猎头恨》描述了一个艾拉兄弟因猎取到救命恩人的头而精神崩溃并最终自杀的悲剧,体现了作者对民族文化的反思和思考。2003年他还出版了《澜沧江畔布朗人》,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进行全面介绍。

除岩香兰和俸春华外,布朗族的写作队伍中还有这样一些人的名字:蒋源、艾帕新、冯朝良、岩香坎、岩帕新、普秀高、王军江、蒋在凡(又名蒋一凡)、张栋林、李国强、苏国荣、袁冰、陶玉明等等。

怒族作家：

据有关史料记载,怒江因怒族而得名,在怒语中这条奔涌的大江被称为“怒米挂”(意为黑水)。

怒族人口只有两万多,一直在怒江两岸与大白

少数民族文艺

□黄 玲

然和谐共处。怒族虽然没有文字,却有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以世世代代唱调子、讲故事的方式流传至今。1988年,云南人民出版社曾经出版了怒族作家叶世富等人搜集整理的《怒族民间故事》,收有各种民间故事73篇,对怒族作家文学的出现起了一定的铺垫作用。

1952年出生于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的彭兆清,笔名里介尔保·阿图,是怒族第一位作家,也是怒族历史上第一位出版了小说集、第一位获过全国文学奖的作家。近年来,彭兆清已经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诅咒崖》,散文集《灵性的土地》《七彩仙境》《流动的驿站》等等,一直坚持在文学创作领域努力奋斗。他的作品《女神岩祭》收入了《中国少数民族经典文库·短篇小说卷》。

怒族还相继涌现出彭义良、叶世富、李绍恩、罗沙益、普利颜、彭兆坤、李文华、高文明、施文兴等一批作者。这对于只有两万多人口,在怒江大峡谷中生息了千年的怒族来说,是历史的奇迹,也体现着一个民族发展进步的历程。

独龙族作家：

独龙族旧称“俅人”,据2000年云南省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独龙族有5884人,主要分布在独龙江乡和贡山县境内怒江西岸的小查腊村。独龙族过去没有文字,生产生活都靠刻木结绳记事。新中国成立后,独龙族聚居地开始建立学校、发展民族教育。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独龙族已经有了自己的大学生和研究生。

1979年,第一位独龙族诗人阿柏在《边疆文学》上发表了诗歌作品《独龙桥》。这是独龙族第一首见诸于刊物的诗歌,虽然还带有民歌的风格,但却是第一首独龙族自己写自己的诗歌作品。这首诗1981年荣获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

此后还有独龙族诗人新学先写过《短歌》等诗。齐建平在《边疆文学》1982年第10期发表散文《独龙江之春》,描写改革开放给独龙江地区带来的变化。1993年,马文德在《边疆文学》第4期发表散文《编织彩虹的人》,描述独龙人的民族文化风情。这些诗歌散文都侧重于表现独龙江的变化和独龙人的审美思想。

罗荣芬,是独龙族第一位女学者,也是第一位女作家。近年来出版了《自然怀抱中的纹面女》,通过“自然之女”、“母性天职”、“与天地沟通的中介”、“我们家的女人们”几个角度,以现代视角展示了传统中的独龙族女性的人格和精神世界。她还著有调查随笔《生死之间——独龙族对灵魂的话题》《阿娅的故事》《遥远的阿S》《我的故乡河》等作品。

云南7个“人口较少民族”的作家文学,对云南文学乃至整个当代中华文学来说,都是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它在体现自身独特性的同时,也丰富了同时代的中华文学内涵,体现了一个多民族国家文化事业多元共存的繁荣局面。

多年来,云南省文联、省作协、《边疆文学》等机构对7个人口较少民族的作家文学的成长提供了许多切实有力的支持与扶助,使之健康发展,并收获了可喜的文学成果。

多民族共居的云南红土高原有一片肥沃的文化土壤,在一个改革开放、发展进步的新时代,7个人口较少民族的作家文学定会朝着美好的明天继续发展,诞生出更多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优秀作家和作品,为红土高原增添更美的春色。

(注:文中人口统计数据暂以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参考。)

□王 迅

这种深切的体恤之情也贯穿在中篇小说《冰雪中的玫瑰》的叙述中,成功塑造了当代农村妇女刘珍珠的形象。在丈夫病逝后,生计成了她和儿子要面对的头等大事。刘珍珠和其他农民工一样,还是选择了城市。她的工作是为经贸局看守大门,但事实上她每天要做的事情远远不止守守大门这么简单和轻松,而是严重地超负荷工作:办公室的清洁卫生,烧开水,清除冰渣,包扎水管,与歹徒搏斗……为了让儿子正常读书,她只能忍辱负重,备受生活的煎熬。而这种生活之“重”的呈现,在作者的叙事中,并不是对事物表象的陈述,而是通过陌生化的手法和细致的心理刻画传达出来的。在这个人物身上,我们可以隐约看到刘姥姥和阿Q的影子,事实上也映照出我们整个民族的灵魂。对人物心理的深度开掘显然是这篇小说最值得称道的地方。

在写人物时,作者完全以一个传统的中国农村妇女的眼光去打量人物灵魂的复杂性,跟踪人物的心灵轨迹。刘珍珠身份卑微,却总爱与人争吵,为了宠物狗到处闹别扭的事,甚至与单位领导的夫人大骂开来。但考虑到年底的奖金和自己的贫困现状,她只能无奈地一再忍耐和妥协。更有意味的是,作者通过刘珍珠对空调的新奇感受,以及她把自已的现实处境与乡下的农民进行比较,表达了人物文化身份的转变引起的思考。在刘珍珠的意识中,乡下农民是无法见到局长这样级别的大官的,而她几乎可以天天见到。“这一切的一切是一般农村妇女能比的吗?”作品透过农村妇女的视角,深刻揭示了人物意识中潜藏的等级观念,不仅表达了作家对底层生命的深切体恤,同时也折射出传统农民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对传统乡村文化观念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反思,使向本贵的叙事深入到社会文化心理的潜在层面。这部作品以生存于都市的当代农民对乡村的回望视角,呈现了作者对民族现代化的忧思。而这种纵深层面的文化忧思所凸显的知识分子情怀,也正是当下文学写作中所缺少的一种思维品质。

■声 音

用最优美的中文作品 写出最美好的中国人形象

□艾克拜尔·米吉提(哈萨克族)

随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实体,文学也应该发挥它的作用。我们应当以最优美的中文作品,写出最美好的中国人的形象推向世界,献给所有热爱中文阅读的读者。因为中文读者不局限于中国人,而是那些广大的、所有正在学习中文的不同肤色的读者。新时期以来文学发展的轨迹,从“反思”到“消解”,到最后书写“自我”等等,似乎陷于某种自怨自艾抑或是自我欣赏。但是现在世界需要什么?世界需要一种优美的、能对中国文化产生认同感的作品。

我国经济的强势发展,带来“中国制造”产品遍及世界,我们在世界各地开始进入当地经济生活。在各大洲一些国家兼并企业,在当地组织生产,在当地开采矿产。在经历了以资本为后盾的最初的喜悦期之后,我们的企业与产品依然面对的是世界范围的市场经济竞争,同时将要经历和接受当地法律条款检验与磨合的关隘,最终要超越人文障碍方能站稳脚跟。而这才是最终的竞争。这一点仅靠企业和经济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它需借助文学的力量。我们的中文作品,应当形成超越人文障碍的亲亲和力量。受众对中文写作有着更高的期待,中文写作无疑对提升我国软实力发挥着历史性的作用。



“2009年的夏天,在北回归线穿越的蒙自城郊……我蛰伏在党史资料的旧书堆里,像虫子一样静静蚕食那些霉纸上的方块字。试图循着时空隧道进入80年前的地下党岁月,与一个政党的历史对话,与井冈山一样的蒙自交谈,寻找和守望那些无序中的秩序。”

这段文字,摘自王必昆《云岭红墙》一书中《云南的“井冈山”》的结尾。2011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当我读到还散发着油墨芳香的《云岭红墙》时,我被王必昆充满深情的文字再一次打动,我又想起了两年前在网上伴随他写作此书的那些日子。

从2009年开始,云南青年作家王必昆却埋首书斋和故纸堆中,一个人“静静地蚕食那些霉纸上的方块字”。这是一件需要定力和勇气的事情。彼时,我知道他的工作刚刚发生了变动,他由主管地方文体工作的岗位调到“史志办”。工作性质的由动而静,由显而隐,并没给他带来太大的心理落差和写作停顿。相反,他很快就适应并找到了自己新的方向:他要为地方那些可歌可泣的尘封历史做一番新的价值评估。他开始为这桩有意义的事情着手准备。他在网上告诉我,其实很多年前,他就为蒙自一个叫“查尼皮”的村子写过文章《风雨查尼皮》。我找来那篇文章,文章开篇第一句话是这样的:“我想云南人若不知道查尼皮,就如同中国人未曾听说井冈山一样说不过去。”我想,这应该是我见过的书写查尼皮的所有文字中,最让人难忘的一句话。这当然是一个联想和比喻。生出这个奇特联想和比喻的时间,是1994年必昆首次踏访查尼皮时——那时,他是以一个筑路者的身份去拜访查尼皮的。查尼皮的风雨,在必昆心中酝酿发酵了近20年。终于,他不仅书写出《风雨查尼皮》,还直抒胸臆地写出了《云南的“井冈山”》这样的文章。这篇对蒙自、对查尼皮,有着大爱深爱的文章,其叙述是那样的情深意浓。必昆能说出这样的话、写下这样的文字,与他从来就敢爱敢恨的秉性有关。在他更早的著作《大南门》中,就不乏敢爱敢恨的文章。我还记得他在《乡村暗疾》中,对父老乡亲缺血少药的境况,是怎样的痛心疾首;在另一些篇什中,他对那些日渐失传的民间手艺,又表现出怎样的惆怅叹息。现在,他又以自己的赤子之心,去洞察那些尘封已久的历史,去抚拭那些“霉纸上的方块字”。由《风雨查尼皮》而生出《云南的“井冈山”》,由《云南的“井冈山”》而生出《云岭红墙》——这不仅是量变,更是写作的质变:他的写作,由自发而自觉,他正向着更高的写作质量和思想境界努力着。

细读《云岭红墙》,我感到这是一部有体温、有细节、有现场感,有很强的情感冲击力,同时又有较深刻的理性精神的党史文学作品。书中所写到的那些活跃于滇南、活跃于蒙自、活跃于查尼皮的云南地下党的早期领导人,是那样富于朝气,充满理想的激情,又是那样地有坚定的信念。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为了“主义”,都陆续献身。但这些行为,一点也不盲目,更不是简单的冲动。

在必昆笔下,我们看到,在查尼皮那低矮的茅草屋里,他们不仅热烈地讨论真理,寻找云南地下党的出路和前景,更是与农民打成一片,平日里也跳舞、写诗、唱歌,用必昆的话说,“他们一点都不枯燥”。

必昆用他充满感情的笔触,将那些埋藏在历史深处的人物一个个复活。今天我们读来,这些人物不仅可敬,而且可爱、可亲、可学,可以站在我们的队列前头,成为这个时代最有感召力的榜样。我想,如果党史和其他革命史,有一部分能写成这样,这对今天的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将会是一桩多么亲切的事。

必昆书写历史,不仅注意了将感情融入其中,还注意了将历史的理性精神灌注其中。他不人云亦云,不简单照搬现成的历史定论,而是通过自己的路访、辨析、思索、考证,找到更接近历史真相的答案。比如他对云南共产党最早领导的农民暴动,到底是发生在蒙自“小红寨”还是“小东山”的考证,就做得有理有据,书写得有枝有叶。他写早期云南共产党人杜涛,笔锋一转却到了广州农民讲习所,从那里的一份档案、一个借书卡上的签字,找到杜涛参加革命的精神之源。类似的书写在《云岭红墙》中还有多处。它让我们看到了必昆是为书写革命、用功之深,用情之深。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需躬行。即便是以文学之笔书写历史,尤其是书写革命历史,不仅要有充沛的激情,还要有高度的理性、严谨的态度,才可能书写出让时代和人民满意的作品。必昆在《云岭红墙》中的写作实践,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云岭红墙》以主要篇幅书写云南早期共产党在蒙自的活动,使该书成为了解云南红色历史的一部重要作品。同时,该书还将蒙自在抗战时期参与到西南联大办学的一段历史,以及解放战争时发生在大陆的“最后一仗”,以附录方式收入书中。这样,就把蒙自在近现代史上最重要的几个历史片段有机地串联了起来,让读者尽览蒙自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风貌,并找到其中的内在逻辑。

2011年7月8日,我和一群朋友,沿着新修的一条直通查尼皮的道路,来到依旧如旧的查尼皮。我知道,这条道路以及那些纪念馆陈列室,是必昆和他那些热爱并重视查尼皮历史价值的朋友们,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而修建起来的。在查尼皮,我们聆听着必昆如数家珍的讲解,仿佛聆听到历史深处的巨大回响。我想,查尼皮——云南的“井冈山”,因为必昆的这个比赋,将会发出更大的感召力,让更多的人,来这里聆听和阅读,感知和受益。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谢谢作者。

一往情深 的历史叙述

——评王必昆《云岭红墙》

□冉隆中

照亮民族根性的体恤与忧思

湖南苗族作家向本贵作为“文学湘军”老将,至今仍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生命力。身为编辑,我曾多次向其约稿。在我的印象中,向本贵是一个朴实的写作者,对文学抱有一股来自内心的敬畏感。尽管他创作颇丰,文学成就卓著,但为人低调,写作扎实,是他一向的人生姿态与创作取向。

向本贵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作家。他出生在湖南省沅陵县,沅陵的社会生活、风俗民情自然成为他前期创作的主要叙事资源,创作风格上呈现出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地域情调。但从他编辑的三个中短篇小说中,却看到了他的思考不仅富于本土性和民族性,而且有一种内在的穿越人性的力量,但对人性的刻画却不是那种常规的表层观察,而是能开掘出一种民族根性,是一种“灵魂的深”。由此我认定,向本贵是一个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小说关注底层,体恤民众,试图揭示我们整个民族的深层心理结构,以及传统农耕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复杂性。短篇小说《两个老人和一丘水田》发表于《广西文学》2008年第10期,后被《小说月报》2009年第1期连载,并被改编成电影。小说叙写了在中国城市化进程正如火如荼推进的今天,依然留守并渴望着耕种田地的两个老农的故事。尽管他们的下一代由农村陆续逃往城市,享受现代性带来的充裕的物质生活,但在主人公看来,“那可是两脚挂在半空中”。种田可以治病,甚至可以延长人的生命,当然这种古老的农耕神话也消除了两个老人20年的隔阂,缝缀那根植于传统农耕文明的心灵创伤。由结怨到解怨,皆由那丘水田。

其实,这是一种很真实很淳朴的传统农民情结。作者把人物放到城乡交叉的视角中进行透视,从而检视出隐藏在农民灵魂深处的认识迷障。他们对城市化无法理解,甚至带有某种抵制的心态。中国宏伟的城市化战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显然,农民需要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如黄灿灿的谷子。如今,也许农民这种对土地的固守已经远远超出了吃饱肚子等物质方面的范

畴,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依然是一种解不开的农民的乡土情结,一种典型而本质的农民精神,而且深深地刻印在老一代农民的心坎里。向本贵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极有价值的命题,那就是中国的城市化如何逐渐向农村逼近,现代意识如何才能真正地深入几亿农民的意识之中。换句话说,中国的城市化战略的实施,要想达到预期的效果,仅仅依靠城市的工业化从而向乡村无限地延伸和扩展,还是远远不够的。要真正地实现城市化、现代化,必须首先实现人的城市化、现代化。只有具备现代意识的人,才能有力地推进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向本贵的深刻之处,在于他看到了这一严峻而沉重的现实,于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具有现代意味的文学命题:如何实现人本身的现代化问题。无疑,这是一个极具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的命题。在艺术上,作者借用了意象化的手法,小说中水田、谷子、篱笆等作为文化符号,无不洋溢着象征的意味。在客观冷静的叙述中,那丘稻穗飘香的水田间,隐藏着作者对民族未来深切的忧患意识。

在短篇小说《青山怀抱的山岗》(《广西文学》2009年第8期)和中篇小说《冰雪中的玫瑰》(《广西文学》2010年第7期,被《小说月报》转载,获广西文学中篇小说奖)中,作者把审美视点从乡村转移到城市,其观照对象虽然还是来自农村,但作为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农民工,其文化身份显然已经改变。前者写一个流落他乡的北方青年的爱情信仰,主人公刘启明对爱的追求,并非功利心使然,也非纯粹的“身体”追逐,而是源于内心对善的渴求,以及对苦难生命的追求与拯救。同时作者通过对刘启明对小吃店女工伍年秀的跟踪、追求到痴迷整个过程的叙述,塑造了一个内耀着人性光辉的打工妹形象。文字中弥漫着忧伤与哀怨,但更多的是一种生存的痛感惨杂其间。伍年秀在生活中极端地苛待自己,甚至以卖身为手段挽救重病的母亲,而这又直接导致了刘启明爱情梦般的幻灭。其中的悲剧性意味显示出作家对底层深切的人文关怀和体恤之情。